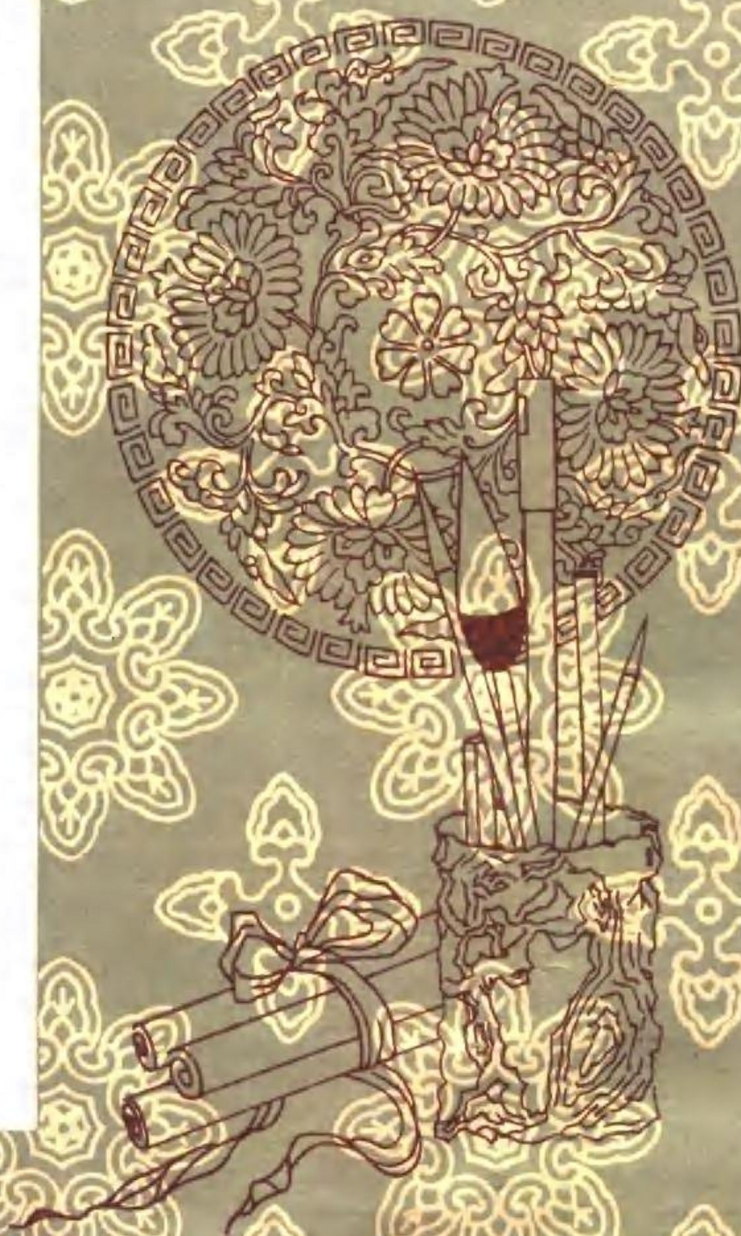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特辑

隋唐及宋代 書畫研究選編



书目文献出版社

6599
5

隋唐及宋代书画研究选编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特辑）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河北省南宫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10½ 印张 269 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统一书号：8201·26 定价：2.60 元
〔内部发行〕

目次

唐代书坛奇杰李邕和他的书法艺术·····	余城	一、
宋代画风转变之契机——徽宗美术教育		
成功的实例（上、下）·····	李慧淑	五〇
院藏隋画两轴析论——並谈成陀罗在莫高窟		
凿窟造像的相关问题·····	苏莹辉	九九
苏东坡诗和崔白双喜图——论宋画阔绢狭绢问题·····	李霖灿	一四〇
大字阴符经题跋与书体之研究·····	李郁周	一五一

唐代書壇奇傑李邕和他的書法藝術

余 城

壹、前言

在我國歷史上，唐代是書學極度盛行而成就非凡的時代之一。造成這種情勢的原因，予以分析有下：一是唐代在政治史演進的時間上，與隋代相鄰緊接魏晉南北朝後，正好承接着這個時期蓬勃興盛的書學風氣發展，有水到渠成之勢。二是唐代為漢後建立的一個大一統帝國，武功強盛，相應的也大力從事文治發展，文學藝術活動十分熱絡。三是唐代歷朝皇帝特別喜嗜書法，多能提倡與獎勵，造成社會濃厚的書學風氣。這也是其中最直接與主要的一項。

唐代自太宗在位（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開始，由於個人喜愛書法，尤其嗜好王羲之父子作品，廣肆蒐羅二王及前代書蹟，心摹手追的熱衷臨習而外，更將書學正式列入政府教育與掄才的考試制度中。根據「唐書」中記載，唐貞觀元年，詔取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弟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而唐代選舉人才，有擇人之法四，其中一項便是書法。又國子監總管七學，也有一學是為書學；書學設置書學博士，教授學生習書日紙一幅。至於其它如後來的集賢院學士，通籍出入太府，卽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內廷內侍省設有宮教博士十八人，其中四人專門教授書法。以上種種，都是當時獎勵與推行書學的措施。這些與書學有關的措施，前後各朝皆能積極推行，而以玄宗時為尤然。於是，蔚成唐代書學的熾熱風氣，使得這一期間成為我國書法上的極盛時期。另外是當時最受重視與流行的書體厥為楷書，在大力提倡發展之下，不僅使得是項書法大家輩出，而且楷則大成，創造了楷書的黃金時代。

唐代發展出來醇正典雅、筆劃規矩的楷書，固然為唐代流行的書體建立了一項楷模，為我國書學領域開拓了新園地，特別是產生了許多偉大的書家，作品垂為百世典範；但是在書法運用的法則上，也發展到了頂端極致的地步。古人所謂「物極必反」，又說「窮則變，變則通」，就在這種書學高峯難於繼續前進的同時，也正無形中醞釀一股求變的暗流，出現一批富

於熱情和渴望新事物，以及不願囿於成法的書家，嘗試於流行的楷書傳統以外追尋新的路子，冀望建立一種新的書學形式和美學標準。在唐代學術思想自由的空氣下，他們都能體現這份理想，不僅獲得自己在書法成就上的豐碩成果，也助長了社會風潮，為其後的晚唐開創書學的新天地，使得唐代後期的書法展現一片與前期迥然不同的景象；更遠的，影響所及，說其改變了其後千餘年來我國書學史的形成與發展，也不為過。當時，那些無形中領導從事書法改革運動的書家中，表現最出色的一人，應該要數李邕了。

李邕，為唐高宗至玄宗時人，活動期間正是唐代文化藝術最臻成熟的時期。在書學鼎盛，人才濟濟的當時，即以一種特立獨行的形象突出時儕，睥睨當世。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人品學識，文章書翰，樣樣獲得時人推崇；其中書法一項尤為出名，不僅生時譽重當代，死後名聲更為隆盛。他的書法，由於風格特殊面目詭異，即使在書家如雲體貌衆殊的唐代，也是顯得崢嶸與突兀不羣，給予當時追求變化書風的書法界相當大的刺激與啓示。死後，他的書風流行不輟，歷代私淑學習者代不乏人，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的書家，成就不凡的也極多，可說對於後世書學形成發展影響尤稱深遠，貢獻甚大。所以，歷代書法評論家和書家，多將他與唐代大家如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徐浩、張旭、懷素之輩，相提並論，給予書法史上肯定性的評價和地位。李邕書蹟流傳後世，遠不及上述諸人為夥，若非書學有過人的成就，又焉能至此；因此堪稱唐代書壇的一位奇傑。

可惜的，如此一位天才型的藝術家，由於流傳存世他的書蹟不多，而且愈到後來愈見稀少，形同星鳳，致令後世知曉其名的人，也越來越少，遑論欣賞其書法藝術了。因此，本文特將他和他的書法美學作一介紹，以不沒其對我國書學發展的貢獻。

貳、李邕的生平和事蹟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生於唐高宗儀鳳三年（公元六七八年），卒於玄宗六載（公元七四七年）。〔唐書〕和〔新唐書〕中，均有他的個傳。

有關他的家世，根據〔新唐書〕「李邕傳」中記載。他的父親名善，頗有雅行，學問淹貫古今，但不能屬辭作文，人稱爲「書籠」。高宗顯慶中，擢官至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曾爲〔文選〕一書作注，敷衍淵洽，獲得皇帝優渥賜賚，並除潞王府記室參軍，再放涇城令。後因與賀蘭敏友善，受案牽連，被流徙姚州。遇赦放還後，隱居於汴，鄭問講學爲生，學生遠自四方而至，傳授學業，號爲「文選」學。

至於李邕本人，幼習文章，即嶄露頭角。他的父親李善注〔文選〕時，採取釋事省義的體裁，書成後徵詢他的意見，初不敢回答，旋經一再追問，才表示應加修改；於是令他試作增補，改寫成附事見義方式。李善見了大喜，認爲不可埋沒，因此兩書一併刊行。他二十歲時，經人引見時任內史的李嶠。見面便表示自己讀書不廣，亟欲一窺內閣祕藏書籍。李嶠初不答應，固請再三，終於允他以祕書監值事名義進入內庫。未幾，即請辭離去。李嶠深感詫異，試問以閣中所藏奧篇隱帙，他朗聲一一應答無誤，李嶠不覺讚嘆他將來必成大器。以上展露了他在文章方面的天份，以及驚人的閱讀能力。

其後，因爲李嶠與當時的監察御史張廷珪的合力推荐，以他文章高氣方直，才堪足任諫諍，武后召拜爲左拾遺，從此正式開始他的宦途事業。就職不久，他的正直和才能立即發揮出來。當時的御史中丞宋璟，彈劾張昌宗兄弟有反狀，武后初不悅，由於他挺身仗義執言，始獲接納。中宗登位，思得長生法術，寵信方士鄭普思，擢任爲祕書監，他剴切陳辭，據理力爭以爲不可，事雖不成，聲名因此鵲起。後以事忤韋后，五王伏誅一案，他因與張柬之友善受到株連，被放爲南和令，再貶富州司戶參軍事。後來韋后亂事平定，以他曾面挫韋后，召回拜爲左台殿中侍御史；彈劾朝中任職毫不留情，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他與洛陽州司馬崔日知大捕黨徒，有功而遷升戶部員外郎。嗣後，他與崔隱甫、倪若水，因受時爲東宮太子的玄宗禮遇，遭到岑羲等人的猜忌，又被貶爲舍城丞。及玄宗登基，他復被召回爲戶部郎中，並得張廷珪與姜皎的合荐，擢爲御史中丞；然而却遭姚崇的忌憚，指爲性情陰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後來，玄宗封泰山還經汴州，他前往見駕呈獻辭賦，深獲玄宗歡喜；却因矜肆如故，而與張說交惡，爲仇人誣告贓賍枉法，下獄當死，得人相救，貶爲遵化尉；後隨中人楊思勗討伐嶺南賊有功，徙遷澄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他被起爲括州刺史，喜與利除害，復坐誣枉獲罪，幸得天子識其名，下詔勿劾。其後轉任淄、滑二州刺史，再奉召入朝，以諂媚不能久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

柳勣有罪下獄，他因曾遺勣馬匹，爲人利用構陷指爲互通休咎，而被平素忌恨他的宰相李林甫加上罪名，請詔派遣刑部員外郎郝順之、監察御史羅布爽，前往就地杖殺於郡所。死時年七十。

李邕生性忠烈剛毅，正直嚴厲，有種近乎好名使氣的性格。例如他任左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奏劾張昌宗兄弟有不順狀，請付發斷，武后不悅，他在階下即大聲應道：「環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武后始色解。既出，有人對他說：「你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他回答：「不顯不狂，其名不張。」他同時更疾惡如仇，正義凜然，絕不退縮妥協；因此導致他的不容於衆，奸佞對之切齒，羣儒爲之側目。然而，他也有敦厚溫情的一面，如重義愛士，深懷服善之心，有故事二則：一是開元中，有右司員外郎蕭誠，善作褚、薛體書，但不爲李邕重視，於是採取西山野麻、號郡土穀，製造五色斑文紙，僞作王右軍書帖，送給李邕；李邕不辨以爲真蹟，把玩不已；蕭誠於是說明原委，李邕深爲歎服。二是同時另有中書侍郎徐安貞，善作隸書，後因參劾李林甫用事而獲罪，逃隱於衡嶽；適有某寺修建佛殿，於是爲書題梁；李邕過寺看見大驚，立刻召見同載而歸。另外拯孤恤窮，救乏賑惠，以至家無私聚等，加上他忠義凜節的情操，因而使他贏得天下人的敬仰欽佩。例如他遭仇人誣告下獄當死時，有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甘願代其罪而死，他因此獲減死貶爲遵化尉；妻子溫氏又爲他，自請戍邊代贖。至於他自滑州刺史奉召入朝，民間傳說他眉目瓊鼻，羣至阡陌夾道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求文章等。考諸唐代政治人物中，鮮有受到民間如此景仰愛戴者。因此，代宗時，特別追贈祕書監銜。

縱觀上述李邕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宦途多舛，始受沮於韋后，中見忌於張說，卒被誅於李林甫；才名四十年，而陷身毀謗謫戍，貶竄遠裔，坐席不暖；一世忠義，終不得好死。死後，杜甫作「八哀詩」以悼之，足令天下人爲其浩嘆不已。實在不能不歸因他奇崛的個性使然。然而相反的，因爲他生具這種非尋常的英雄冒險性的性格，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他藝術上獨特不凡的成就。

叁、李邕之文章——撰寫碑頌能手

李邕生前，文章和書法，即與他的忠烈剛毅的性格一樣享譽於世。唐李肇撰〔朝野僉載〕中記載，說他是「文章、書法

、正直、辭辨、義烈、英邁，皆過人，時稱六絕」。宋陳思撰的「書小史」中同樣說到，他「以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文章、書翰、公直、詞辨、義烈、英邁，皆一時之傑。夫人之藝術，多不兼稱，至於王逸少以書掩其文，李淳風以術映其學；如公之藝，六事咸絕，古今罕傳」。而在這些品德藝事之中，特別以文章的名氣最高，這也是唐代重視文采甚於其它的關係。

李邕的文章，世傳以碑頌文字爲其所長。然而如前述生平事蹟中，說到他年少時曾爲乃父改寫「文選注」，博得聲譽早著；青年時以文才見賞於李嶠、張廷珪，推許他的文章高氣方直，才堪足任諫諍，因而踏入仕途；其後玄宗封泰山還經汴州時，他曾前往見駕奉詔呈獻辭賦，玄宗見了大悅。說明除了碑頌而外，其它如辭賦等其它文體也都不錯；只是因爲唐人較爲重視碑頌一類文章，而他又在這方面特別傑出而已。

按碑體文章之由來，始自秦漢。其時碑石原爲有穿而無字的下葬墓具；嗣後有以墓中主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於石上的；「西京雜記」中記載杜子夏葬長安時，臨終作文，命刻石埋葬，可能是墓誌最早有記載的開始。東漢墓葬刻石風氣逐漸興行，已有碑、誄、表、銘、頌之別；然而惟重所葬死者，在於欲其不朽，刻諸金石而死有令名之意。所以凡撰文書碑之人，俱不著姓名，所列僅如門生故吏，刻於碑陰或別碑。再後，諛墓之文風氣日興，至隋唐而大盛，則不重葬者而重撰文之人，甚至書寫刻者俱在墓求之列。例如書史記載唐代書家蘇頌，爲丞相蘇瓌之子，善書八分；時有東明觀道士周彥雲，欲爲其師建碑，因與蘇家往來熟稔，於是對蘇瓌說：「（墓）成，志不過煩相君數子耳，五郎（頌）文，六郎（冰）致石，七郎（誄）書。」風氣熾盛由此可見一斑。

李邕在世，中朝衣冠士夫及天下寺觀，多齎金帛求其撰寫碑頌文章，杜甫有詩形容其情形，是「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這是因爲唐代索人爲文作書，盛行餽贈潤筆的緣故。他爲人撰文的收入，「唐書」「李邕傳」中也有記載，說是「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不過，他的收餽雖然如此豐厚，却「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了。

他的文章，因爲生前沒有專集刊行，後人於無法獲得完整資料閱讀之下，所以也一直缺乏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性評介文字

出現。不過，由於他所撰碑類多喜自己書丹，後世收藏家什襲珍藏少數流傳他的碑拓書蹟，實際也等於保存了部份他的文章，如知名的「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嶽麓寺碑」等，世人於欣賞其書藝之餘，同時也可略窺他文章風格的一斑；讀來鏗鏘有聲，有種奇崛磊落之氣。有關他的文章，因非本文研究範圍，此處暫且不作進一步討論。

肆、李邕之書法——擅長真行書

李邕的書法，和他文章的風骨崢嶸一樣，以種風致超逸、蒼勁清駿的形象，兀立於唐代衆多書家的作品中，面目尤其顯得鮮明顯眼。依照現代文藝心理學理論的詮釋，認為藝術是人類性格表現的話；那麼，他的這兩項藝術所展現的特殊形貌，正是他那奇矯不羣的個性之象徵了。

李邕對於書法的專擅，根據前人的說法，歷代書法藝評家所作的評論。如唐李嗣真「續書評」中稱，「李邕真行書，如華嶽三峯，黃河一曲」；宋陳思的「書小史」中稱他，「善行書」；「宣和書譜」中稱他，「精於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南宋姜夔的「續書譜」中則稱，「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真」；元陳繹曾的「翰林要訣」第十三「法書」中，論行書法書，即舉出有他的嶽麓、娑羅樹二帖爲代表；明初張紳的「法書通釋」「中立篇」中，分書法爲真書、章草、飛白、真行、行書、行兼草、草書、逸書、雜體等九體，李邕的書蹟皆列入真行書中。至於其它論述尚多，歸納起來大率不出類似說法，指他主要擅長行書或真行書（又稱行真書），其次草書偶一爲之，此外便不及其它書體。

這種真行書（或又稱行真書）名稱，首見於唐代，即上述李嗣真「續書評」一書中，顧名思義，是種非楷（真）非行，亦楷亦行，行楷摻雜一起的書體，其特殊的性質，借用明項穆「書法雅言」的解釋，是「真書以方正爲體，圓奇爲用，草書以圓奇爲體，方正爲用；真書是端楷爲本，作者不易速工，草則簡縱爲多，見者亦難便曉，不真不草，行書出焉；似真而兼草者，行真也」。由此可知，其本質雖仍屬於行書，却是形體較爲偏於楷書的行書。以李邕的書蹟實際看來，情形確實如此。

李邕在書法方面，獲得時人和後世的讚揚與推崇，除了獨創他那特殊別致的真行書，還有便是被認爲肇開歷史上以行書寫碑的一人，兩者對於後世書學的發展俱產生極大的影響。

李邕生活的時代，剛好是我國書學史上體法端嚴筆劃規矩的楷書的熾盛時期，而當時社會也正值書碑風氣盛行，在此前後的著名書家，如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徐浩、顏真卿、柳公權等人，楷書俱能各備體勢，各有千秋，光華燦爛，號稱一代大家。這些人雖然也偶作行草書體，僅限於平時尺牘書翰，惟於碑刻必定施以典正端雅的楷書，這也是一項具有歷史傳統的作風。因為我國書法自魏晉以來，行草之書僅用於簡札尺牘，至於金石銘刻必屬正書，所以鍾繇稱正書為銘石。唐代書家皆能謹守此一法統。然而，李邕却率先打破了這項傳統的束縛，首開以行書入碑之風，使用他那奇崛挺勁而熟鍊的

魯親里并官

碑器禮漢東

君諱朗字義朱

碑朗谷吳國三

君諱玄字黑女南

北魏
張黑女碑

杓足之地亮論

唐高宗書李勣碑

自漢至唐碑體書法之演變

(一圖柿)

真行書體施於碑刻，為流行寢廣的寫碑書法藝術中創立一項新體例、新形式，引起後來書法家的羣起效尤，間接的也開啓後世行書的風行，更為他自己贏得這項新書學開創者的頭銜。如元鄭杓於「衍極」一書中，即謂「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於千載而下，（李）邕以行狎相參，後復倂異百出，邕作俑也」。姑且不論前人對於這項行書寫碑批評的臧否如何，不過以往大家一向認為李邕首開其端的說法，似與事實不符，筆者認為恐怕有商榷的必要。

根據現有存世的唐代書蹟中，以行書寫碑而時代早過李邕，筆者所見即有唐太宗的「晉祠銘」（貞觀二十年書）和「溫泉銘」（圖版壹）；高宗的「李勣碑」（儀鳳二年書）（圖版貳）；武后則天的「昇仙太子碑」（聖曆二年書）（圖

版叁)。至於前人著錄而不見書蹟流傳的，則有唐太宗行書「魏鄭公碑」(貞觀十七年)；高宗行書「萬年宮銘」(永徽六年)、「紀功碑」(顯慶四年)、「登封紀號文碑」(乾封元年)；賀蘭敏行書「岐州法門寺舍利塔銘」(龍朔三年)；高正臣行書「明徵君碑」(上元三年)；王大義行書「黎尊師碑」(儀鳳二年)；王懸河行書「道藏經序」；「追尊玄皇帝詔」(弘道元年)；劉翊行書「化善寺石井碑」(天授二年)等。如此多的行書碑刻，足證李邕前早已有人開行書寫碑之先河；尤從太宗、高宗、武后所書碑字看，書體尚較李邕所書自由流暢而更近似純正行書。當時這類自由而能表現自我意志的書法，曾經給予性情高傲活潑的李邕極大的刺激，啓發他毅然選擇作爲自己書學的目標，應是殆無疑問。不過，李邕同時和以後，行書寫碑突趨盛行與蔚然風尚，如當時書家王繹、徐浩、張從申、楊播、王璿、張誼、吳通微、儲陽、王綸、劉遵古、韓棼材之輩，都熱心嘗試這項新興的碑書，爲當時書壇平添一片求變的氣氛，也爲唐代後期書學發展開拓出一條途徑，則不能不歸功他的倡導與帶動。因此，至少可以說，李邕在唐代興起的這一傳統書學改革運動中，由於率先熱心領導推動行書寫碑，並且憑恃自身在這方面輝煌的成就，加上他政治上建立的傳奇式形象造成的魅力，影響到這項書法與寫碑的大行其道，因而居有承先啓後發揚光大的功勞，則是不爭的事實。

伍、李邕書學之淵源與形成

李邕在書法上，能够獨樹一幟，開創出一種特殊的書體和風格，爲後來的書家學習與祖法，間接的影響到後世書學的發展，對於促進我國書法史的進步與豐富書學領域而言，誠有所貢獻。

不過，他所擅長的眞行書，體貌上雖然特殊，仔細考察仍舊隱藏着傳統的影子，具有前人書法的骨肉血脈根源。對於他的書學淵源與受到前人的影響，歷來書論家與書家談到的頗多，說法與主張也各有不同。

明解縉於「春雨雜述」論書中，即謂：

「書自蔡中郎邕(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傳至隋而爲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世南傳歐陽詢(率更)與褚河南遂良(登善)；遂良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虔禮

（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薛稷傳李北海書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東之（下略）。」這是說他在書學上遠紹蔡邕，近接褚遂良和薛稷。其次，如宋桑世昌《蘭亭考》中引述南唐後主李煜評論唐代諸書家的話，說：

「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其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硬；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

這是說他師法王羲之，而且歷代承襲這種說法的人很多。如明何良俊《四友齋書論》中論唐代書家，便說：

「歐陽率更得右軍之骨；虞永興得其膚澤；褚河南得其筋；李北海得其肉；顏魯公得其力，此即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者也。」

項穆的《書法雅言》中，說：

「隋唐以後，書法名家皆出逸少，褚遂良得其鬱壯之筋，而鮮安閒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疎窘；顏、柳得其莊毅之操，而失之魯獷。」

同書中敘書體之演變，論歷代書學源流，說：

「書至子敬，尙奇之門開矣。嗣後智永專範右軍，精熟無奇，此學其正而不變者也；羊欣思齊大令，舉止依樣，此學其奇而不變者也。迨夫世南傳之智永，內含剛柔，立意沉粹，及其行草逾媚不凡，然其筋力稍覺寬敝矣。李邕初師逸少，擺脫舊習，筆力更新，下手挺聳，終失窘迫，律以大成，殊越數率，此行真之初變也。」

至於如宋米芾《海岳名言》中，所說：

「李邕脫出子敬（王獻之），體乏纖濃。」

以及一些明代書論家也談到的，說是李邕書雖學右軍，然而握管用筆，結字緊密，抑揚低昂，實在原出於太令筆意。這種說辭則又是認爲他的書法源出王獻之的主張。

以上這些紛紜分歧的說法，雖有不同，加以綜覈整理，仍然可以尋出其脈絡相通。蓋我國書學自魏晉趨盛以後，習書日重師學，前代大家碩學，源流不絕，普被後世尊崇私淑，所以探本溯源，皆有師法淵源關連。李邕書法，若從書蹟實際考察，上述前人所說「其書始變右軍行法」，固然不錯；又說其「體脫子敬」，或是「師法褚、薛」，也未嘗不是沒有道理。事實上他的書法表現了一種他人所沒有的融合性特色。這種情形的產生，予以分析原因，則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關係。

首先，前面言中已有所述，唐代是我國歷史上出名的重視書學發展的朝代，書法正式列為國家教育與舉用人才的措施項目。因此，凡是踏入仕途之人幾乎無有不能書者，更造成唐代名書家皆出為官者的特殊現象；李邕出身仕宦之家，想來習書必是他從小的家庭課業之一。其次，唐代書學特別是楷書發展，雖然成就臻至頂峯極致，但是尚能保持活潑的自由風氣，書家習書思想不受束縛而能選擇自己喜好發展，這則是造成他書學淵源複雜的原因。至於他書學形成的實際情形：唐代提倡與振興書學，由於太宗開始即醉心王羲之父子的字，廣事蒐羅二王尤其羲之墨蹟，根據書史記載太宗時，王知敬等奉命整理內藏前代法書，剪裁梁朝舊有王字即得二千二百九十紙，合成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其後歷朝續有增添，玄宗開元間鍾王書蹟高達一千五百十卷。此外，君臣上下競相臨習不遺餘力。因此蔚成王羲之書法，儼然成為唐代書學發展的最高指導，也是書法的理想和鵠的；當時書家幾乎無人不受影響，而以皇室書家所受為尤重。這一現象，只要稍加留心唐代皇室書家的存世書蹟，例如前面已加介紹過的唐太宗、高宗和武后的法書（圖版壹、貳、叁），仔細加以考察，字裏行間無不顯露出濃重的王書神貌，便不難明白。於是，這便形成了唐代皇室書學發展的一項傳統；而且這項源出南朝行書帖學的皇室書學，與同時承襲北朝正書碑學的一派書家，如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人，彷彿形成當時書法發展上面貌迥異壁壘分明的兩個系統，各自擁有自己的學習者和勢力。李邕早年學書，因為家世與唐代皇室同宗的關係，在書學源流的扶擇上，可想而知，必定傾向而選擇了皇室一系殆無疑問。這點經由他存世的書蹟，拿來與上述太宗三人法書比較，可以看出體態雖然不類，格韻則是十分接近，便可獲得證明。日本書論家伏見冲敬在談論李邕雲麾碑的文章中，認為他的書法受到唐太宗很深的影響，事實上他近似高宗的地方更明顯，這正是由於三人同學義之而能共造堂奧的關係，殊途同歸，看來自然是形神一致了。另一方面還說明他因為謹守王氏書學傳統，也正是造成一生專擅真行書，而不涉其它書體的原因。

李邕書學主要淵源王羲之，也可根據其它存世書蹟，作一實際的探討。以他的「雲麾將軍李思訓碑」，與唐代代表王書的書蹟「聖教序」（圖版肆）比較。「聖教序」為太宗撰寫闡述三藏法師西域求取佛經的一篇文章，釋懷仁集王羲之書字以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十二月正式勒石立碑，為寓有弘揚佛法與王書書法雙重意義的一件書蹟，也是學習王書的標準法帖。此

（神圖二）

大 夫 文 生 名 威 宗 常

為 經 形 益 德 圖 寶 將

朝 軌 海 論 得 楊 遷 雅 難 觀

（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十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二十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三十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四十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五十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六十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七十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八十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一）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二）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三）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四）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五）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六）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七）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八）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九十九）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一百）為懷仁集王羲之書

「大」、「夫」、「文」、「生」、「名」、「威」、「宗」、「常」、「為」、「經」、「形」、「益」、「德」、「圖」、「寶」、「將」、「朝」、「軌」、「海」、「論」、「得」、「楊」、「遷」、「雅」、「難」、「觀」

觀」等（見圖二），仔細加以比較，可以清楚看出兩者間，除了書家因為性格的不一，書法方面出現少許的形態上自然差異而外，體格筆致和神韻上呈現明顯的一致性，顯示相互間密切的淵源關係，這當然是他學王而非王學他了。上面這項書字比較的結果，證實了前人指稱他書學步趨王羲之的正確性外；同時却說明了五代迄明的另一說法，即認為他學王書「得其氣而失於體格」的與事實不符；他的書學實以剽取王字體形為主，而能「善於巧變」，「擺脫舊習」，達到脫胎換骨的境地。

其次，李邕生活的時間，正是杜甫所說「書貴瘦硬方通神」，普遍崇尚褚遂良、薛稷一派清勁遒美書法的時候，他的書學無形中自然也受到此一書風的影響。褚遂良、薛稷與虞世南、歐陽詢，被稱初唐書法四大家，同以清勁雅健的書體建立唐代初期書學的典範。然而褚書已經趨於變格，書字中出現筆劃的起迄兩端稍重、粗細變化的現象；有種用筆靈巧，結體姿媚

天地而難窮

唐褚遂良書
雁塔聖教序碑

至如石蓮

唐薛曜書
夏日遊石淙詩
石刻

未無為而化

唐魏栖梧書
善才寺碑

書精震

唐李邕書
李思訓碑

以為適合褚薛一派用筆與王書體格而成

（三圖排）

，豪勁清潤，溫雅婉約兼而有之美感；以他所書「雁塔聖教序」（圖版伍）比較虞（圖版陸）、歐（圖版柒）二人書蹟，便可一目瞭然。薛稷於四家中最為晚出，書學師法褚遂良而能發揚光大，他的書蹟已經不見流傳於今，但從前人記載，以及現存能傳其學的薛曜惟一書蹟「夏日遊石淙詩」刻石（圖版捌）看來，此書筆態遒麗，被認為精神體貌最似薛稷書的作品；從書中明顯看出那源自褚書的頓挫轉折筆法，較褚更為強烈誇大，展現一種變化更大更活潑的形象，則可想見其書法形貌的一般。褚、薛創始這種摻入新筆法的書體，對於其前的虞世南、歐陽詢而言，無愧可以冠以新楷書之稱。新楷書用筆創新的地方，也就是其特色所在，有三點：一是筆劃無論橫豎，起筆與收筆的兩端均呈粗大，甚至成

爲點，二是橫豎轉折處有頓挫起伏，形成字形有似聳肩；三是運筆使力強勁，形似勒筆，鼓努生姿，富有挺健遒麗之美。這項特色同時影響到當時正在醞釀求變的楷書和行書。兩者書家均踴躍師法與效尤，而能够將其發展到極致的，楷書方面爲顏真卿、柳公權（圖版玖）二人；行書方面則是李邕。前人記敘稱李邕學習褚遂良和薛稷，指的即是他受到此派是項新書學筆法的影響，然後運用於承襲王羲之而來的行書上，於是形成他那特殊體形的真行書。李邕書學受到褚、薛的影響，還可從存世另一件書體形式頗爲接近他，同樣源出於褚、薛書派的唐魏栖梧書「善才寺碑」（圖版拾），獲得進一步的認識。這件存世孤本的書蹟，無論書字體格和用筆，都保持着褚遂良的風格，惟書法純熟與活潑，顯示是件結合褚書和行書經過轉變成熟後的作品，以其用來比較李邕的「雲麾將軍李思訓碑」（見圖三），兩者看來意態神韻俱極相似，尤其在筆致的趣味上更是接近。予以探討，追溯原委，誠爲出於一樣師承筆法發展出來的緣故。過來，也足以證明李邕書法的確源出褚、薛，而且影響深重。

再是，李邕的書法在書字的安排上，大致尚保持着楷書間隔整齊的規格，但在個體的書寫上，則打破以往前人平正規整的舊習，而出之以大小相間、正欹參差的變化，抑揚低昂的姿態，加上結字緊密，前人認爲這是受到王獻之書風影響最顯著的地方。如清王澐的「虛舟題跋」中便說，「孫虔禮議子敬，以爲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泰和（李邕）祖法子敬，特又過之」。按諸王獻之的書蹟（圖版拾壹），也確實能够尋找出此一淵源的蛛絲馬跡來。

此外，在書字的運用上，李邕也表現了他的兼容並蓄的包融性，南北不同的字體俱出現其書法中，如「龍」字不同的寫法「龍」、「龍」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李邕書法除去這些得自他人的有形特色外，還無形中流露着一種南方地域發展出來的書學所獨有的瀟灑飄逸的氣質；使人於觀賞他的書法作品之下，很容易聯想到東晉的「羣龍顏碑」（公元四五八年）（圖版拾貳）、南北朝南宋的「劉懷民墓誌」（公元四六四年）（圖版拾叁）、南梁的「瘞鶴銘」（公元五一四年）等書蹟。它們書體雖然不類，但在某些方面，例如書體的結構和用筆，書字的排列組合，韻致的古樸奇峭，都是十分接近。它們之間時代相距甚遠，當然不會有什麼師學淵源的關係存在；那麼，應該歸與書家奇特的性格相同，或者是同爲南方人的地緣關係形成的不知名自然因素使然。

綜合以上所述，大致說來，李邕書學的淵源雖然相當複雜，但是主要不出王羲之、王獻之和褚遂良、薛稷的影響。他在書字的形態方面，擷取了王羲之字形；在用筆方面，採用了褚遂良、薛稷一派新楷書的筆法，於是構成他的真行書體格；在書法行氣方面，則運用了王獻之草書的欹斜偏側思想。最後，本乎自身高邁的天資、縱橫的才氣，終能綜覈融和以出，達到和諧而無衝突的完美境界。這正是「墨池通錄」「筆勢」篇中，所說「凡書，通即變」，「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的道理。而且又說「王夔子雲體；歐陽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書中得仙手，皆得法後自變其體，俱得傳名」。

伍、李邕書蹟之流傳情形

李邕生前在世為人撰寫的碑文極多，如杜甫詩說他「碑版照四裔」；南宋高似孫「緯略」一書中記載，謂唐人已有李邕前後撰碑八百首的說法。他所撰碑文，而且喜歡自己書寫；甚至傳說有的還自己親自書寫上碑。這種書寫碑字，古人謂之「書丹」。書家自己書丹的風氣，在重視書碑的唐代也是非常盛行。原因是書字於碑多以朱筆為之，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所以書丹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則不足，而以筆瘦為佳；若欲刻者不失真，未有如自己書寫為理想。因此愛惜羽毛的書家，深恐己書經由他人轉手，不慎造成形神損傷，多喜自己書寫上石；唐代除李邕而外，顏真卿也喜愛自己書丹。書丹而外，書家也重視刻碑的刻工，例如元趙孟頫與人寫碑，若非茅紹之刻石則不書，蓋以其人懂得筆意原故。明何良俊「四友齋書論」中說到，李邕、顏真卿諸碑，皆親手書丹，而為黃仙鶴、伏靈芝致（刻）石；甚至說李邕書且皆自己刻石，所謂黃仙鶴、伏靈芝，都是偽托的化石。由此可知，李邕生前所寫的碑刻書蹟必定很多。不過唐代的文物古蹟，經過五代的兵連禍結，遭到嚴重的破壞損毀，殘存下來的已經有限；他的書蹟情形也是如此。

北宋時，李邕書蹟流存數量已是不多。其後，愈到後來愈見減少，幾至稀如鳳毛麟角。他的書蹟，大致可以分為墨蹟和碑刻兩部份，茲分別加以介述於後。

(一) 墨蹟部份